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法] 罗曼·罗兰

名人传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北京燕山出版社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译 序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 20 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法国外省一小市镇的公证人的儿子,童年是在外省度过的。1881 年,全家迁居巴黎。罗兰考入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当时是以思想矛盾冲突激烈著称的法国文化中心之一。

少年时代的罗兰以斯宾诺莎和古希腊的所谓“先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与他所反对的种种唯心主义潮流相抗衡。

自青年时代起,他便非常喜爱莎士比亚、雨果和歌德等作家的作品,并在许多地方模仿过雨果的创作手法。但在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列夫·托尔斯泰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当他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就给其作品在法国广为流传的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写信,向后者提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很遵从托尔斯泰对他的劝告。

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选择了音乐史作为自己的专业。1912 年前,他一直作为音乐史教师在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任教。

19 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法国第三共和国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社会冲突激烈。罗兰与著名作家左拉、法朗士等一样,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他参加了为德雷福斯案件辩护的斗争;他宣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当然,他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还带有朦胧的浪漫主义幻想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他在瑞士居住,在报刊上发表

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呼吁交战各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积极反对战争。其文章明显的反战热情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瑞士，他接触了一些俄国侨民，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自1917年起，他同高尔基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联系。到大战后期，他对群众的革命力量的信心更加增强了，在《先声》集中收入的他的1916年的文章中，他直接向交战各国的人民——而不像一开始时那样，只向其知识分子们——呼吁，期望他们能够采取坚决果断的反战行动。

罗兰从苏维埃俄罗斯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它的朋友，不过，他对苏联的国内政策也存有某种戒心。20年代，他徒劳地试图以甘地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与世界革命的原则相抗衡。30年代，他成了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他与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多列士、高尔基的友好关系在加强，其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占法国和维希政权的建立对罗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年近多病的他在敌占区法西斯政权的监视下，基本上只是作一些关于贝多芬多年研究的收尾工作及写点传记、回忆录等。

罗兰在二战结束前，于1944年12月逝世，未能活到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那一天，但活到了法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日子。欢迎多列士回国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1944年11月，他出席了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

罗兰是作为剧作家登上文坛的，他的早期作品有悲剧《圣路易》(1897年)，是收入其戏剧集《信仰悲剧》的卷首篇。收

入该集的还有《阿埃尔》(1898年)和《时间会到来》(1903年)。但从1898年到1938年,他几乎花了毕生的心血在创作《革命戏剧集》。其中包括:《群狼》(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丹东》(1899年)、《七月十四日》(1901年)等。

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年至1912年)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的篇章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无论是半封建的德国及其小市民的因循守旧习气,还是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成了罗兰激烈抨击的对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葛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七月十四日》完成之后,罗兰开始写传记体裁作品。后来,他把不同时期写的三个传记——《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罗兰打算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20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的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赋聪颖的个人,而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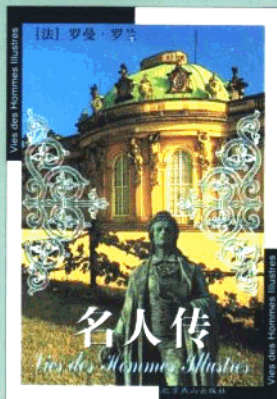
问题的人。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贝多芬传》中。罗兰笔下的贝多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所以,尽管贝多芬经受了许多的痛苦:爱情希望的破灭,贫困,以及最后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仍然坚强不屈,最后在欢乐的凯歌声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

关于中译本的译名,似应题为《三大师传》更为贴切。题为《名人传》有些欠妥。首先,罗兰在将三位大师的传记汇集成一册时,只是称作《英雄传记》(Vies héroques),也没有说是《名人传记》。“名人”一词比较泛泛,即所谓“著名人物”的意思。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了名的人”。而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当然是“著名人物”,但他们更是在自己专业方面的独树一帜的大师,一位是音乐奇才,一位是雕塑绘画方面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位是文学巨匠。所以题名为《三大师传》更贴切,使读者一看书名即可知晓是三位大师级人物的传记。但鉴于《名人传》已通用,改了反而不利,所以仍用了这个译名。

陈筱卿

2000年岁末

世界文学文库



平面设计/康笑宇工作室

总 目 录

译 序	1
贝多芬传	1
米开朗琪罗传	77
托尔斯泰传	205

贝多芬传

目 录

序 言	5
贝多芬传	9
贝多芬的遗嘱	41
书信集	49
思想集	69

序 言

在我写我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那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我并未在想搞音乐学方面的事。那是1902年。我经历着一个苦难的时期,满是毁灭与更新的雷雨。我逃离了巴黎。

我在我童年伙伴的身边,也就是曾在人生战斗中不止一次支持过我的那个人——贝多芬——的身边,暂避了十天。我来到他在波恩的家中。我在那里又发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的老友们,也就是说我在科布伦兹从其孙子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了由魏恩加特纳指挥的他的交响乐演奏会。随后我又与他单独在一起,在雾濛濛的莱茵河畔,在潮湿的四月那灰暗的日子里,我倾诉着心曲,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弗洛伊德所感染,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为我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信心倍增,与人生重新缔约,并向神明唱着痊愈病人的感谢曲。——这支感谢曲就是这本短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由佩居伊再版。我未曾想过这本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不过,“人各有命……”^①。

我对自己在这里说了这些细枝末节表示歉意。我应该回答那些今日前来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

^① 原文为拉丁文。

著作的人。我是个史学家，但是按自己的时间去做。我在几部书中对音乐学尽了一种很大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和我在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不是这样的研究著作，它并非为了学术而作。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谢救世主。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的信仰的和爱情的行为均皆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人们纷纷抢购。这本小书交了好运，这是它未曾希冀的。那时节，在法国，有数百万人，属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它，于是，他们便跑来恳求他。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它们宛如作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时的一些教堂一样，——谁不记得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那些痛苦不堪的面庞！今天活着的人是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的。（但他们将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吗？）从本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都被一扫而光：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儿子中的最优秀者都消失了。我的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之辈写的小册子，走出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在人手相传。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小书；尽管有所不足，但我将不作什么改动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其原始特征以及伟大的一代的神圣

形象。在贝多芬百年忌辰之际，我既缅怀他，同时也颂扬其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纪念那位教会我们如何生与死的人。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贝多芬传

